



JLWE

Journal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Evaluation

JLWE, Vol. 2, No. 1, 2026, pp.20-28.

Print ISSN: 3078-8129; Online ISSN: 3104-5073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lwe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lwe260103ecedo>



由伦理走向逆伦理

——《威廉斯多普》中的亲缘、姻缘与血缘秩序的裂隙

张梦伟 (Zhang Mengwei), 谭惠娟(Tan Huijuan)

摘要: 赫尔曼·查尔斯·博斯曼的遗作《威廉斯多普》深刻揭示了南非种族问题的伦理困境。本文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通过分析小说中亲缘、姻缘与血缘关系在种族隔离下的扭曲,提出“逆伦理”这一核心概念,旨在阐明种族主义如何通过“伦理倒置”系统性地逆转日常伦理,构建其自我辩护的规范体系。研究指出:在亲缘关系中,责任发生错位,人物在伦理自觉中仍走向失范;在姻缘关系中,欲望被政治化为维系种族边界的工具,表现为“道德化渴望”与“堕落化占有”的双重模式;在血缘关系中,“逆伦理”性达至顶峰——血缘触发“白人恐慌”,白人父权借“理性意志”将混血生命判为“污染”,从而将保护生命的伦理义务倒置为排除生命的暴力。至此,“伦理”沦为清除行动的修辞工具。

《威廉斯多普》由此呈现了一个伦理结构失衡却依靠“伦理倒置”逻辑持续运转的社会图景。这表明种族隔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更是一套深度内化、以伦理倒置为核心运作的意识形态系统。小说超越具体历史语境,凭借对“逆伦理”机制的洞察,成为审视权力侵蚀伦理、身份在伦理废墟上重建的后殖民文学典范。

关键词: 博斯曼;《威廉斯多普》;逆伦理;亲缘;姻缘;血缘

作者简介: 张梦伟,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非洲文学。

电邮: 2786846168@qq.com。谭惠娟(通讯作者),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非洲文学,比较文学。电邮: huijuantan03@163.com。

Title: From Ethics to Counter-Ethics: Disintegrations in the Order of Kinship, Marriage, and Blood in *Wilhelmstorp*

Abstract: Herman Charles Bosman's posthumous novel *Wilhelmstorp* profoundly exposes the ethical predicament underlying South Africa's racial issues. Employing the methodolog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ystematic distortion of kinship, marital, and blood ties under apartheid as depicted in the novel, proposing the core concept of “counter-ethics.” The aim is to elucidate how racism, through a mechanism of “ethical inversion,” systematically reverses everyday ethics to construct a self-justifying normative system. The study argues that: in kinship relations, responsibility becomes displaced, with characters veering into transgression despite ethical awareness; in marital relations, desire is politicized into an instrument for maintaining racial boundaries, manifesting in a dual pattern of “moralized yearning” and “degenerate possession”; in blood relations, the nature of “counter-ethics” reaches its zenith—blood ties trigger “white panic,” leading white patriarchy to employ “rational will” in condemning mixed-race life as “pollution,” thereby inverting the ethical imperative to protect life into a violence that excludes it. Consequently, “ethics” itself is reduced to a mere rhetorical tool for eradication. *Wilhelmstorp* thus presents a social panorama where the ethical structure is fundamentally unbalanced yet continues to operate, sustained precisely by the logic of “ethical inversion.” This demonstrates that apartheid was not merely a political system but a deeply internalized ideological system whose core operation relied on inverting ethics. Transcending its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 the novel, through its incisive critique of the “counter-ethics” mechanism, stands as a postcolonial literary classic for examining how power erodes ethical foundations and how identity is reconstructed upon the ruins of ethics.

Keywords: Bosman; *Wilhelmstorp*; Counter-ethics; Kinship; Marriage; Blood Ties

Author Biographies: **Zhang Mengwei**, Master's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 African literature. E-mail: 2786846168@qq.com.

Tan Huijuan (Corresponding Author),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Research Areas: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frican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huijuantan03@163.com.

引言

赫尔曼·查尔斯·博斯曼（Herman Charles Bosman 1905–1951）是二十世纪南非文学承上启下的关键作家。其遗作《威廉斯多普》（*Willemsdorp* 1991）因历史审查迟至1991年才完整出版，被视为其最成熟尖锐的文学表达。小说以二战前布尔人小镇为背景，通过两个交织的故事——约翰内斯家庭的伦理崩塌与编辑查尔斯的欲望分裂——揭示种族隔离制度如何侵蚀人伦根基，使亲密关系沦为权力战场，最终呈现“伦理倒置”的悲剧过程。

既有研究已从文学传承、美学渊源与主题象征等角度确立博斯曼的地位（Trump, 1986, p. 164–

178; Schopen, 2019, p. 82-88), 亦有学者指出小说中悬置的谋杀隐喻了白人身份的伦理困境 (Potter, 1986, p. 158-164)。然而, 小说中伦理系统的结构性扭曲及其运作机制, 仍有待深入剖析。

本文拟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 重返历史伦理现场, 聚焦亲缘、姻缘与血缘三重人伦关系在种族政治下的秩序裂隙。研究旨在论证, 这些裂隙并非偶然失范, 而是系统性的“伦理倒置”之征候——善与责任被逆向编码, 暴力被修辞为“必要”。这一倒置过程最终催生了一种自我辩护的“逆伦理”体系。本文试图阐明, 《威廉斯多普》不仅描绘伦理失序的社会图景, 更揭示了伦理自身如何走向其反面的机制, 从而为理解种族主义对人性伦理的根本性腐蚀提供深刻的文学证言。

亲缘伦理中的角色责任错位: 家庭基石的瓦解

伦理困境不来自善恶对立, 而来自“角色责任的错位”。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 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 寻找文学产生的客观伦理原因并解释其何以成立, 分析作品中导致社会事件和影响人物命运的伦理因素, 用伦理的观点对事件、人物、文学问题等给以解释, 并从历史的角度作出道德评价。(聂珍钊, 2010, p. 14) 从这一视角重返布尔人的历史现场, 可以发现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英布战争的彻底溃败不仅带来军事与政治上的溃败, 更导致深层的社会结构性创伤与伦理根基的动摇。农业经济被摧毁, 大量布尔农民失去土地; 农村向城市迁移加剧, 形成“贫困白人”阶层; 在资本、工业与行政体系中处于对英裔白人的从属地位。布尔人虽然是“白人”, 在种族等级中居于上层, 却在阶级与政治权力上被边缘化。这种撕裂的处境——既是压迫者又是被压迫者——为一种深刻的伦理倒置埋下了伏笔: 他们在被英裔压制的集体记忆中构建出“被剥夺的白人”叙事, 将自身困境归咎于帝国资本, 从而系统性地忽略并遮蔽自己对黑人与有色人群体的结构性压迫。作为历史中的“受害者”, 布尔人是否仍需为正在实施的压迫承担道德责任? 这一问题本身已揭示出其伦理位置的内在矛盾与逆伦理倾向的萌芽——即一套将自身苦难置于他者痛苦之上的价值排序。

约翰内斯·伊拉斯谟的道德困境并非源于简单的善恶抉择, 而在于其伦理主体性被深度嵌入并扭曲于制度身份之中。他的自我想象与现实位置之间的鸿沟, 直接导致了其伦理身份的困惑与道德责任的系统性错位。伊拉斯谟不断强调自己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是“组织者”“事务家”, 是能“越过某些高级督察的头”的操盘者。他将自我伦理价值完全绑定于“制度运作中的操控能力”, 坚信只有越权行事, 才算真正履行责任。然而, 博斯曼的反讽叙述无情地揭穿了这一幻象: 在俱乐部中, 他始终被视为“只是个校长”, 被排除在真正的权力中心之外, 其“知情”永远是二手与不完整的。这种渴望认同于统治精英却不被接纳的处境, 使其伦理行为彻底沦为一种空虚的表演, 这正是微观层面上伦理倒置的体现——伦理实践的目的从实现正义异化为表演权力。

妻子玛丽对伊拉斯谟的呼唤, 本应是一次纯粹的伦理召唤: “你会不由得想到农场里的人们……你我都不是在镇上出生的。我们都来自乡下。我们知道干旱是什么滋味。” (Bosman, 1991, p. 33) 她基于共同的乡土记忆与血缘情感, 恳请他履行基本的亲族责任。然而, 伊拉斯谟的反应却暴露了其价值体系的深层倒置: 他考量的并非是否该帮助亲人, 而是此举是否配得上其自命的“事务家”身份。责任在此被彻底转化为一场关于个人影响力的表演。这表明, 在其认知框架中, 伦理价值已被一种扭曲的、以自我形象为中心的逻辑所倒置。

弟弟克里斯杨则呈现了另一种更彻底的逆伦理模式。他“带着乡野的优雅和粗犷的男子气概”

(Bosman, 1991, p. 110), 对女性持彻底的蔑视态度, 唯一敬重的是工作。在他这里, 伦理价值被极端压缩为经济生存的逻辑, 人际关系完全工具化, 工作被奉为不容触及的“圣域”。这种将人的价值彻底物质化、工具化的世界观, 标志着伦理本身在其生命中被清除。他与玛丽的性关系远非不正当关系所能概括, 而是一次伦理秩序的彻底倒置与践踏: 卧室这一象征婚姻伦理的核心空间, 沦为兄弟权力与女性身体进行交换的场所。玛丽在此过程中的复杂体验——快感源于“触及禁忌”与短暂摆脱角色束缚——亦非真正的解放, 而是在被内化的压抑性伦理下一种扭曲的主体挣扎, 体现了系统性的伦理规范如何塑造甚至扭曲人的本能与情感。

匿名电话的插入, 最终将这场家庭伦理悲剧推向了无法挽回的境地, 并清晰揭示了从“伦理自觉”滑向“逆伦理”行动的可怖路径。极具反讽意味的是, 伊拉斯谟对整个事件保持着高度的伦理自觉: 他明知电话的卑鄙、“抓奸”行为的低贱, 甚至预感妻子可能无辜。然而, 这种“明知”并未导向善的选择, 反而加剧了他的行动, 因为其行为逻辑早已被身份表演与权力维护所支配。这种“知善而不为, 知恶而故犯”的分裂, 正是伦理倒置在个体心理上的完成形态: 伦理判断与伦理实践彻底分离, 判断能力沦为对自身罪责的清醒酷刑。枪支的动用是最终的逆伦理宣示, 暴力彻底摧毁了其作为丈夫、兄长和社区领袖的全部伦理完整性。事后的痛哭与“不会有好结果的……通过家族关系给克里斯扬找工作”(Bosman, 1991, p. 67)的哀叹, 只是一种空洞的“虚假和解”。伦理秩序一旦经由自觉选择而被倒置与践踏, 便无法真正复原, 只留下沉重的、自我指控的道德负担。这个家庭的崩溃, 标志着在种族隔离意识形态渗透下, 维系社会最基本的亲缘伦理如何从内部被腐蚀、倒置, 最终孕育出指向更广泛逆伦理秩序的萌芽。

姻缘伦理的两种诡辩: 政治欲望与种族边界

亲缘伦理的断裂, 使个体如失锚之舟, 悬浮于更广阔而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此时, 姻缘及其他亲密关系, 便成为观察欲望如何被种族政治反复规训的场域, 因为它既是情感的舞台, 亦是权力悄然改写身体与欲望的隐秘脚本。

在种族隔离的意识形态框架内, 欲望绝非纯粹的个人情感或生理冲动, 它被征用、形塑为一种践行与巩固种族界限的政治实践。白人男性查尔斯·亨德里克与两位女性——同族的莉娜和有色人种的玛乔丽——的关系, 呈现为两套截然不同却又互为镜像的伦理诡辩。这两套诡辩并非偶然的话语策略, 而是深植于种族隔离制度、供白人男性主体调用的系统性话语装置, 精准揭示了其在“白人至上”秩序下欲望管理的内在分裂, 以及这种分裂如何服务于一种更深层的伦理倒置逻辑——即欲望的实践旨在维护一套逆伦理的种族等级秩序。

查尔斯·亨德里克与莉娜关系的核心, 并非“未遂的爱情”, 而是一场关于伦理自制的精密表演, 其本质是欲望在种族内部纯洁性规范下的自我规训。当亨德里克试图以“道德正当”的方式去渴望同族女性莉娜时, 伦理本身便成了欲望的扭曲镜面与安全阀。他反复进行心理暗示: “这太平静了, 不像是爱”。这种自我否认并非真诚的理性判断, 而是一种将欲望去欲望化、去身体化的话语诡辩, 旨在将其情感纳入白人社会内部“体面”的道德安全区。他刻意回避传统的“男性凝视”, 强调莉娜“不漂亮”, 努力不将其物化为“欲望对象”。然而, 正是这种过度的、近乎禁欲的“自制”, 暴露并再生产了权力关系的不平等: 作为编辑, 他掌握着莉娜专栏的发表权, 其“说服”她继续供稿的举动, 实质是在职业依附的框架内, 维系一种允许他进行安全的情感投射的权力结构。

这种“自制”的表演，本身即是一种象征性权力的诡辩，它允许亨德里克在想象中扮演一个尊重、克制的主体，同时却从未撼动其固有的支配位置。这种将真实欲望压抑、转而表演一种符合内部纯洁性规范的“道德”姿态，本身即是伦理倒置的初步体现：真实的人性情感受压，而虚伪的规范表演被赋予伦理价值。

伦理关系的失衡在科茨街走廊的黑暗中抵达临界点，并瞬间瓦解了自制的假面。“他一手搂着她肩膀，一手搂着她腰，将她压在印刷厂白墙上。一个短暂的吻……那是一个咸味的吻，带着血和海的味。 (Bosman, 1991, p. 74)”这绝非浪漫，而是一次未经同意的伦理冒进与权力僭越。亨德里克的身体行动先于任何语言协商，粗暴地越过了由他自身设定的“道德”边界。这印证了聂珍钊所言，伦理选择由身份决定并反过来建构身份 (聂珍钊, 2020, p. 77)。在此，他“白人男性编辑”的身份驱动了侵犯性的选择，而该选择又将其身份瞬间固化为“侵犯者”。莉娜事后的彻底沉默与“他好像什么都没发生”的冷漠态度，看似反常，实则是弱势主体一种清醒的防御性伦理策略。她以拒绝承认、拒绝赋予事件以叙事意义的方式，单方面终止了这次越界可能带来的进一步情感剥削与道德纠缠，在无力改变权力结构的情况下，守卫了最低限度的自我叙事权。

在同族女性处受挫于这套“体面”诡辩，亨德里克转而激活了另一套更具颠覆性也更为真实的欲望诡辩。他与玛乔丽的相遇绝非单纯的私人放纵，而是种族隔离伦理在“夜间私人空间”中的系统性实践与变形，是逆伦理逻辑在私密领域的直接展开。在酒精与单身公寓共同构筑的、社会规范被临时悬置的非正式空间里，公共领域的种族律令并未消失，而是被内化为一种更隐秘的微观身体政治。查理醒来的第一反应不是“她是谁”，而是启动一套种族识别的扫描程序：她是不是白人？她的五官、肤色、口音是否“越界”？这种凝视本身，即是一种将人物化、分类、并置于种族等级秩序中的伦理暴力。他将越界行为叙述为“是他，而不是那个有色女孩，消除了壁垒”，这堪称一种精妙的伦理倒置式诡辩：将制度性的压迫与不平等，偷换为个人化的“宽容”与“主动”，从而在叙事上完成了一次对殖民逻辑的自我赦免与美化。

“他不能请她坐在椅子上，但可以请她上沙发床。(Bosman, 1991, p. 88)”这一悖论，是理解两种欲望诡辩的核心密码，也是伦理倒置的空间化铭写。它揭示了种族隔离秩序下最尖锐的身体与空间伦理：公共空间的平等象征（椅子）是绝对不可触及的禁忌，那意味着社会身份的承认；而私密空间的性化对象（床）则是可以被消费、被占有的例外领域，那仅仅关乎身体的享用。玛乔丽在叙事层面被系统性剥夺了内在的复杂性与主体深度，被简化为一个常常微笑、缺乏沉思的“可进入的他者”。这是一种叙事层面的伦理降格，通过剥夺其丰富的人性表征，使她得以被顺畅地合理化为—具纯粹的、不引发道德焦虑的欲望身体。这一过程正是通过将他人非人化，来消除逆伦理行为所引发的内在认知冲突。

因此，查理的“自我厌恶”必须被置于种族政治的滤镜下重新审视。他厌恶的核心并非源于对权力不对等的认知，或对制度性压迫的反思，而是根植于“自己竟与‘低贱’的黑人女人同床”这一种族羞耻。这是一种错位的、服务于种族秩序的伦理反省，是逆伦理价值体系内化的结果。其情绪是悔恨，但内核仍是白人至上主义。他的态度差异恰恰表明，他并非被盲目的欲望所控制，而是在莉娜与玛乔丽身上，如切换诡辩剧本般精准执行着两套由种族编码的欲望指令，这双重标准本身就是伦理倒置系统的实践特征。

两次与玛乔丽的相遇，标志着这套越界诡辩从外部空间悖论向内在伦理秩序的升级。第二次，

玛乔丽被“允许坐下”，这看似是边界的松动，实则是查理已将自己完全内化为“伦理失败者”的结果。种族隔离秩序最稳固的维系机制，恰恰在于通过自我厌恶与道德羞辱完成主体的规训。查理全盘接受“白人男性与有色女性发生关系是低贱的”这一社会判决，并以此对自己进行终极裁决。因此，他的“自知之明”不具备任何解放性，反而成了巩固秩序的工具：越界者被标记为“堕落的白人”，而“白人”与“有色人”之间不可逾越的等级鸿沟，却在个体的“堕落”叙事中显得更加自然和永恒。这种将个体罪责感转化为系统稳定性的过程，正是逆伦理系统强大的吸纳与再生产机制。

车站茶室的临别场景，将这两种诡辩策略的对立与共生推向了戏剧性的高潮。莉娜首次袒露内心的愤怒与幻灭，从一个被观看、被定义的客体，短暂地获得了伦理主体的声音与厚度。而查理的意识却被玛乔丽怀孕所引发的“白人恐慌”完全占据，在莉娜的主体性显现面前，他却是伦理缺席的。莉娜在此被他无意识地预设为内部纯洁性的“道德法官”，而玛乔丽则成为其种族污染焦虑的“活体凭证”。

火车的驶离，象征的并非一段感情的终结，而是这种白人男性伦理人格结构性分裂的永久定格——他们必须终生在代表内部纯粹性的“道德法官”与代表越界欲望的“可进入的他者”之间，进行一种分裂性的、永无休止的伦理调适。这正是种族隔离制度以伦理倒置为内核，在亲密关系中最深刻、最残酷的烙印。

综上所述，查理在两位女性间切换的两种欲望诡辩，共同维护着一个分裂却异常稳固的伦理调适系统。它策略性地允许甚至默许跨种族的身体越界，以此作为白人男性特权的泄压阀与确认场；与此同时，它又坚决禁止任何由此产生的情感责任与社会承认跨越种族边界，从而确保种族“纯粹性”的社会象征秩序毫发无损。欲望，在此被彻底政治化，不再是私人领域的情感，而是成为演练、践行与最终固化那条不可见的、却坚不可摧的种族边界的核心工具。这两套看似矛盾的诡辩，实则是一体两面的共谋关系，共同服务于维系以伦理倒置为基础、以清除与排斥为特征的逆伦理秩序这一根本目的。

血缘的“伦理”玷污：逆伦理的象征性清除

在种族隔离的象征秩序中，血缘的纯洁性不仅是生物学的范畴，更是维系其社会等级与身份认同不可动摇的基石。当查尔斯·亨德里克与有色人种女子玛乔丽的关系可能产生后代时，叙事便触碰到了这一秩序最敏感的神经，触发了一场深刻的“白人恐慌”。这远非个人层面的情感或道德危机，而是整个种族主义符号系统遭遇根本性质疑的征兆。本节旨在揭示，这种对血缘“玷污”的恐惧，如何驱动了一整套逆伦理的象征性清除机制。所谓“逆伦理”，在此指涉一种伦理价值的系统性倒置：血缘，这一本应象征生命延续与伦理责任的终极纽带，被异化为必须清除的污染源；而保护生命的基本伦理律令，则被逆转为排除乃至毁灭生命的暴力实践。这一过程的核心，在于将“伦理”话语本身征用为实施清除的合法性修辞，最终使清除行动——这一象征性的清除物——得以在“理性”与“必要”的面具下完成，暴露了种族秩序维系其纯粹性神话所依赖的深刻暴力。

恐慌的根源，首先在于将潜在混血儿预先建构为必须被清除的“象征性异常体”。这是“玷污”的建构成为可能的逻辑前提。查理得知玛乔丽可能怀孕后的反应，绝非父性的觉醒，而是其白人主体性在种族边界前的溃退，这精准地体现了聂珍钊所言的“理性意志”——一种在特定伦理语境中，

为维护既定秩序而进行的冷酷算计（聂珍钊，2011，p. 8）。他内心的独白，“那不会发生在他孩子身上”（Bosman, 1991, p. 159），表面是血缘的确认，深层则是运用一套严密的种族分类逻辑，执行逆伦理的预先审判：将一个尚未出生的生命判决为“不合法的存在”。“混血私生子”“没有未来的存在”等称谓，并非客观描述，而是命名即放逐的象征性暴力。通过这套话语，生命被排除在伦理共同体之外，被建构成对“纯洁血统”的致命玷污。这标志着逆伦理逻辑的启动：血缘的联结意义被清除，转而指向一种必须被净化的基因性威胁。

查理的思维进一步暴露了这种逆伦理运作的政治无意识。他认为混血儿“没有途径表达自我”、“所有门都关闭”，这并非同情，而是一种将社会性压迫自然化、命运化的意识形态操作。他将制度设置的系统性障碍，扭曲为混血儿与生俱来的“本质”缺陷。由此，阻止其诞生这一极端暴力，竟被粉饰为一种“必要”甚至“仁慈”的“理性选择”。这构成了逆伦理的尖锐悖论：在心理层面，他无法否认“这是我的孩子”所携带的微弱伦理回响；但在社会象征层面，他坚决拒绝这一血缘关系的公开合法性。这种“内在承认”与“外在抹除”的分裂，正是白人父权在逆伦理秩序中的根本困境：它必须在扮演（白人内部）道德主体的同时，坚决执行对（跨种族）潜在生命的象征性清除。

然而，“玷污”的抽象威胁必须被锚定于具体的、污名化的空间，才能完成其恐惧的具象化与社会管控，这是逆伦理实践得以深化的关键环节，即“玷污”的空间锚定。查理潜入有色人区的行为，是一次充满象征意义的伦理越界之旅。有色人区在此并非单纯的地理聚居地，而是一个被种族意识形态编码的象征性隔离区与污名容器。白人身体一旦未经制度授权进入此空间，其本身便成为“可疑”的能指。查理为自己预设各种正当职业身份的心理活动，暴露了其最深的恐惧：并非恐惧黑人，而是恐惧自己“无权欲望者”的真实面目在种族地理学的凝视下被戳穿。他的进入，象征着“玷污”的可能源头与“肮脏”空间发生了危险的重叠。

这一重叠在“铁皮屋”场景中达到顶峰，完成了逆伦理的空间定型。玛乔丽裙角在门内的闪现，使她瞬间从私密欲望对象，转变为无可抵赖的公共性伦理证据。私密性被彻底打破，潜在的“血缘玷污”与“肮脏、贫困的黑人区铁皮屋”这一空间意象牢牢绑定。“不能出生于铁皮屋”——查理的最终决断清晰揭示：在此逆伦理的象征系统中，一个生命的价值与权利，自其被构想之初，便已由其种族起源与象征性的“出生地”所预先裁决。铁皮屋作为物质与象征的双重底层空间，成为吸纳并“证明”这种玷污的最终场所。清除威胁，因此不仅关乎血缘，更关乎将白人父权从这种耻辱性的空间锚定中“拯救”出来，维护其象征意义上的“纯洁”。这一定位过程，本身即是一种空间化的清除预备。

最终的“解决”方式，将清除从个体的心理计算与空间驱逐，上升为一种集体性的、叙事层面的象征性净化仪式，这也是逆伦理机制的终极完成形态，即“叙事的清除”。玛乔丽之死及其与“奇迹坑洞”传说的并置，完成了一次极其高效的叙事清除与责任蒸发。她从有血有肉的个体，被物化为一个无名无姓、可供闲谈的奇闻主角——“那个跳进坑洞的有色女人”。其死亡被奇观化，具体的痛苦与背后的权力压迫在传播中被抽空。

“奇迹坑洞”由此从一个自然地理存在，升格为一个吞噬所有“越界”后果的象征性伦理深渊。其物理上的“深不可测”，隐喻着白人共同体道德底线的无底线坠与对罪责的无限容量。通过共同讲述并相信这个将谋杀转化为自愿“奇迹”的传说，共同体成员在不进行任何实质性忏悔的前提下，完成了一次集体的心理赦免与道德净化。玛乔丽及其所承载的潜在血缘，被一同抛入这个叙事

的黑洞中消失无踪。这一叙事行为，本身即是那个最关键的象征清除物：它并非实体，却以传说为载体，有效地从集体记忆与伦理责任中“清除”了活生生的他者。

血缘的“伦理”玷污正是逆伦理的功能性前提；它以维护“纯洁”为名，系统性地将血缘纽带逆转为污染恐慌，将生命责任逆转为清除暴力。而所谓的“伦理”，被工具化为实施这一切的合法性修辞。最终，通过从话语建构到叙事清除的系列象征操作，种族主义秩序生产出其维持自身所需的终极清除物：一个被抹消的他者与一段被净化的历史。博斯曼的冷峻笔触揭示，在这种极端形态下，伦理并非简单的功能性逆转，而是一场针对生命本身的、精致而残酷的象征性谋杀。这构成了《威廉斯多普》对种族隔离制度最深刻的批判：它展示了一种倒置的伦理系统如何可能，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类心灵将付出何等代价。

结语

通过对《威廉斯多普》中亲缘、姻缘与血缘三重人伦关系的逐层剖析，本文揭示，博斯曼所描绘的伦理失序景象，绝非偶然的个人悲剧，而是种族隔离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的毛细血管中渗透与再生产的必然结果。这一过程呈现为从“伦理错位”到“伦理倒置”，并最终形成“逆伦理”系统的完整轨迹。

从亲缘伦理的错位开始，家庭这一情感与责任的天然载体，沦为了权力展演与工具交换的战场，揭示出伦理角色与义务关系的根本性扭曲。进而，在姻缘伦理的操纵中，欲望被政治化为划定与巩固种族界限的工具，白人男性通过在“道德化渴望”与“堕落化占有”两套脚本间的切换，实践着一种深刻的伦理倒置——将占有伪装为自由，将压迫叙述为宽容，从而在欲望领域完成了对伦理价值的系统性逆向重估。最终，在血缘伦理的清除中，这种倒置逻辑走向了极端：血缘触发“白人恐慌”，“理性意志”将生命保护倒置为生命排除，伦理话语被彻底工具化为实施暴力的修辞。至此，一种自我辩护、自我循环的逆伦理系统宣告完成——它并非没有伦理话语，而是建立了一套将排斥、清除与等级固化正当化的逆向规范。

因此，《威廉斯多普》的伟大成就，在于它超越了特定历史问题的写实呈现，通过精湛的叙事将种族隔离解构为一种深度内化的伦理编码工程。它深刻地揭示，当一种意识形态致力于对人的价值进行绝对化的种族分类与等级排序时，它所摧毁的不仅是具体的社会关系，更是伦理价值本身得以成立的基础。博斯曼以其超前的文学洞察，不仅记录了南非的痛苦过去，更贡献了一个关于权力如何通过“伦理错位”诱发“伦理倒置”、最终构筑“逆伦理”世界的普遍寓言。这部小说因而成为审视一切系统性压迫如何腐蚀人性伦理根基的文学典范，并稳固确立了其在后殖民批判传统中的先驱地位。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Zhang Mengwei ^{ID} <https://orcid.org/0009-0007-6260-1716>

Tan Huijuan ^{ID} <https://orcid.org/0000-0003-0855-8511>

References

Bosman, H. C. (1991). Willemsdorp. Human & Rousseau.

聂珍钊 (2010): “文学伦理学批评: 基本理论与术语”, 《外国文学研究》(01): 12-22。

[Nie Zhenzhao (2010). “Literary Ethical Criticism: Basic Theory and Key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01): 12-22. DOI: <https://doi.org/10.19915/j.cnki.fl.s.2010.01.003>]

聂珍钊 (2011): “文学伦理学批评: 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 《外国文学研究》(6) 0: 1-13。

[Nie Zhenzhao (2011). “Literary Ethical Criticism: Ethical Choice and the Sphinx Factor.”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 1-13. DOI: <https://doi.org/10.19915/j.cnki.fl.s.2011.06.001>]

聂珍钊 (2020):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 《中国社会科学》(10): 71-92, 205-206。

[Nie Zhenzhao (2020). “Value Orientation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Ethical Criticism.”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0): 71-92, 205-206.]

Schopen, I. (2019). “Poe on the veld: Herman Charles Bosman’s use of Edgar Allan Poe as a literary model.” *American Studies International* (02). DOI: <https://doi.org/10.5325/amerstudint.31.2.0001>]

Trump, M. (1986). “The short fiction of Herman Charles Bosman.” In S. Gray (Ed.), *Herman Charles Bosman* (pp. 164–178). McGraw-Hill.

Potter, A. M. (1986). “The threat of the wild: Sources of racial tension in Bosman’s Willemsdorp.” In S. Gray (Ed.), *Herman Charles Bosman* (pp. 158–164). McGraw-Hill.